

# 考古一生

## 安志敏先生 纪念文集

A Lifetime of Archaeology

《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 编

 文物出版社

# 考古一生 安志敏先生 纪念文集

A Lifetime of Archaeology

《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 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11

责任编辑：张庆玲  
责任印制：陈 杰  
封面设计：周小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 / 《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  
编委会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010-3245-7

I. ①考… II. ①考… III. ①安志敏 (1924~2005)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3641 号

**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

《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达利天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35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245-7 定价：210元

# **A Lifetime of Archaeology**

## **Essays in Honor of An Zhimin**

*Edited by*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A Lifetime of Archaeology: Essays in Honor of An Zhimin

Cultural Relics Press

Beijing · 2011

《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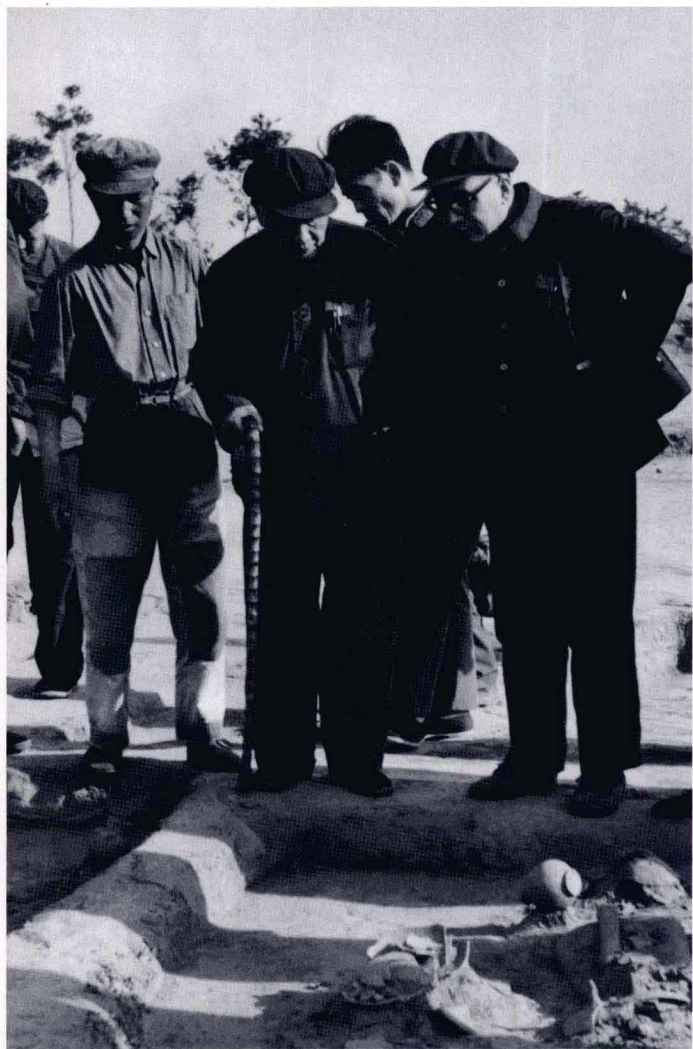
马洪路	王仲殊	邓 聪
叶小燕	安家瑶	安家瑗
张长寿	巫新华	陈志达
陈星灿 (执行)		郑振香
杨 泓	周永珍	金则恭
曹 勇	商志禛	焦天龙
谢仲礼	谢端琚	傅宪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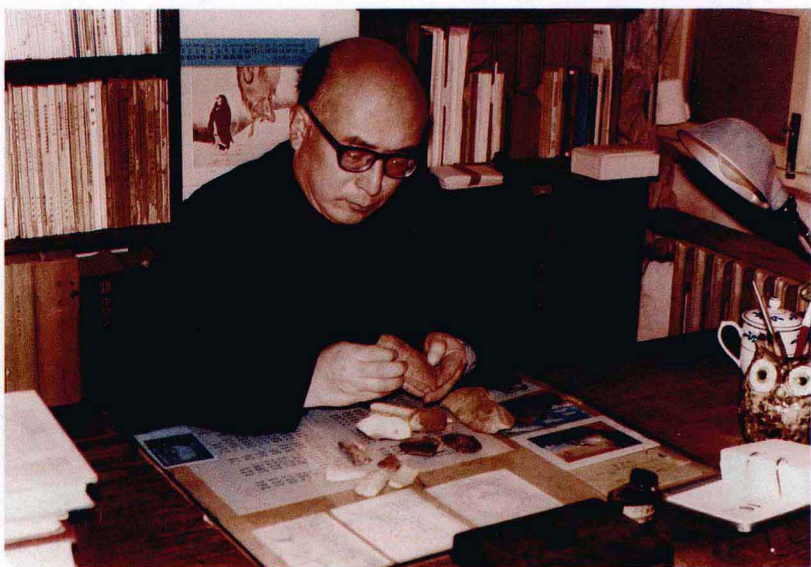
一 1968年拍摄的全家福



二 安志敏先生1980年于考古研究所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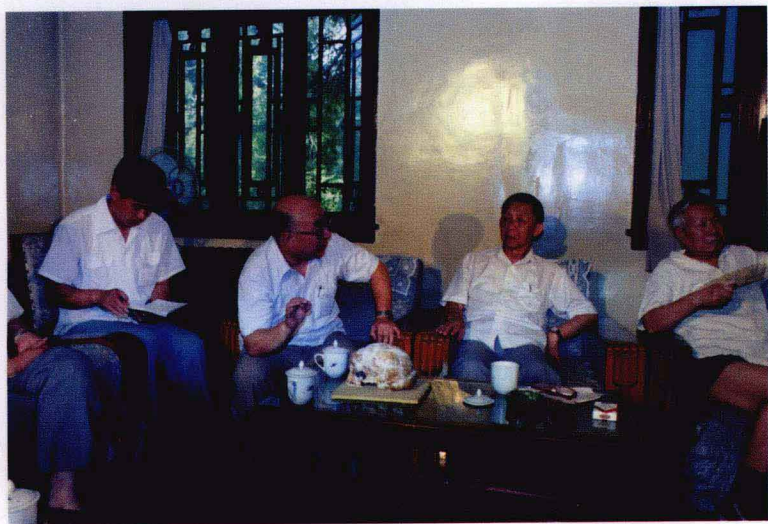


三 1977年5月安志敏(右)、郑乃武(左)陪同裴文中(中)先生考察裴李岗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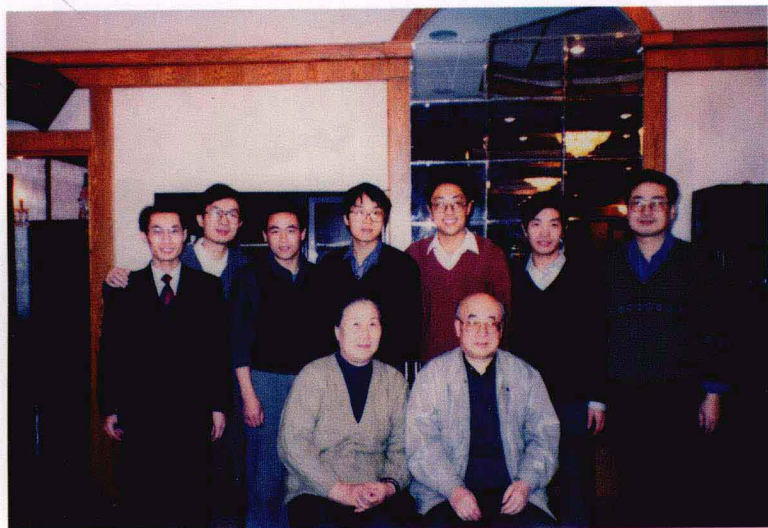


四 1981年安志敏先生在办公室观察石器标本

五 1988年夏天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部分委员及工作人员与该年毕业于的硕士研究生曹勇、米如田、陈星灿合影(前排自左至右:王仲殊、苏秉琦、安志敏、佟柱臣;后排自左至右:冯浩璋、卢兆荫、张长寿、曹勇、米如田、陈星灿、仇士华、郭振录)



六 安志敏与朱德熙(右二)、苏秉琦(右一)先生在一起



七 1995年元旦安志敏先生和家人及研究生合影(后排自左至右:谢仲礼、曹勇、巫新华、陈星灿、焦天龙、傅宪国、安家墩)





八 1996年初夏安志敏先生在考古研究所与张光直(中)、王仲殊(左)先生合影



九 1998年安志敏夫妇与孙辈们



一〇 1998年10月安志敏先生与长女安家瑶在洛阳



一一 1998年安志敏与饶宗颐(中)、邓聪(右)先生于香港大学



一二 1999年安志敏、张裕珠夫妇与王仲殊、陈凯夫妇在大觉寺



一三 2001年5月安志敏先生与次女安家瑗在下川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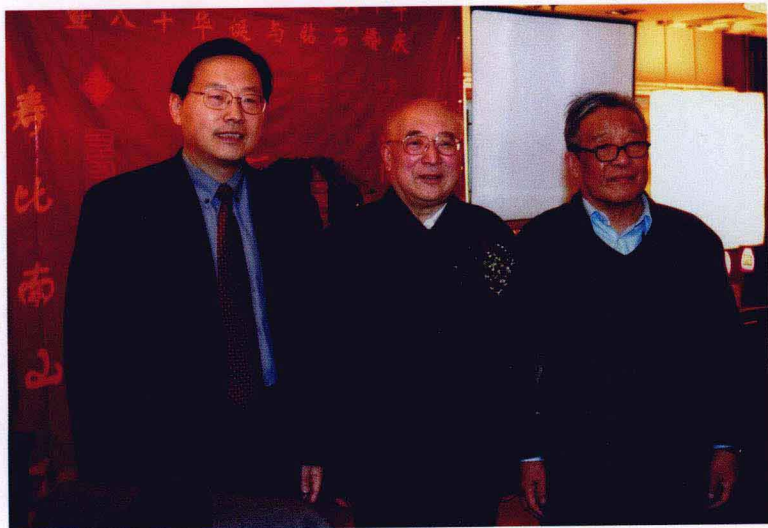
一四 2002年安志敏、张裕珠夫妇与安家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契丹王朝》展览



一五 2002年安志敏先生与邓聪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



一六 2002年安志敏夫妇于南京



一七 2004年4月在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诞辰宴会上安志敏与王仲殊、王巍先生合影



一八 2004年4月安志敏、张裕珠夫妇与女儿安家瑶、安家瑗及曾外孙女曾子滢参观恭王府花园



一九 2005年春节前安志敏先生携夫人和长女安家瑶给师母梁思永夫人李福曼（左二）拜年（左一为梁思永女儿梁柏有）



二〇 安志敏先生骨灰安放处



二一 位于十三陵林区龙山纪念林的双柏——父亲树

# 安志敏先生传略

陈 星 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一

安志敏先生 1924 年 4 月 5 日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2005 年 10 月 26 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 81 岁。

1928 年，先生 4 岁时举家迁往辽宁大连，在大连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1941 年 4 月初中毕业，5 月迁往北平，升入艺文中学（今长安中学）高中。1944 年，先生从艺文中学毕业，升入中国大学史学系。次年，在中法大学文史系旁听裴文中先生讲授史前考古学，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实习；同年，抗战胜利后又结识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教授，时相过从，获得教益。这是先生学习考古学的开始。1948 年 6 月大学毕业，旋即为燕京大学历史系兼任助教，协助裴文中先生史前考古学的教学实习，并负责史前陈列馆的整理工作。次年 2 月，代裴文中先生讲授史前考古学。9 月入北京大学史学研究所，成为考古组的研究生。1950 年 4~5 月，26 岁的安志敏先生，参加了尚未正式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发掘队的实习，8 月辞去燕京大学历史系助教，10 月成为考古研究所助理员，并参加了考古研究所成立之后组织的在河南辉县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接受系统的考古学田野训练，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职业考古生涯。

进入考古研究所工作之前，安志敏先生曾师从裴文中、鸟居龙藏、齐思和等考古学和历史学名家，进入考古研究所工作以来，梁思永先生是他的导师，又跟从夏鼐先生到河南辉县、郑州、成皋、洛阳、浍池和湖南长沙等地参加调查和发掘，亲炙夏鼐先生的教诲，接受了严格、系统的考古学田野训练。先生一生的研究，坚持走田野考古的道路，虽然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主，但也旁及旧石器时代和历史时代，其视野之开阔，领域之广博，研究之深入，跟他所受的专业训练和他的师从当有很大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着繁重的全国范围内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任务。安志敏先生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一名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分子。“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所参加和主持的考古工作，遍及黄河、长江和东北各地。除了上述河南、湖南的田野工作之外，举其重要者如下：1952年主持河北唐山贾各庄战国墓地发掘；1953年主持河南陕县考古调查；1954年调查河北怀来大古城遗址、曲阳商代遗址；同年及次年参加洛阳中州路发掘，调查河北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1956年主持黄河三门峡水库复查、刘家峡水库普查及河南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的发掘；1957年主持陕县上村岭和后川墓地发掘，调查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1958年主持调查青海湟水流域及兰青铁路沿线遗址；1959年任安阳发掘队队长，主持发掘殷墟遗址；1961年主持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晚期洞穴遗址发掘；1962年调查内蒙古海拉尔松山细石器遗址；1963年出任考古研究所东北队副队长兼第一组组长，主持调查内蒙古赤峰、宁城和辽宁沈阳、鞍山、海城、盖县、抚顺、大连、金县、锦西、朝阳、喀左一带的史前遗址，次年主持旅顺双砣子、将军山、岗上、楼上、卧龙泉和尹家村遗址发掘；1965年春主持沈阳郑家洼子遗址发掘；同年8月至1966年6月，风华正茂的安志敏先生，“参加山西永济干樊村四清运动”；1966年7月~1971年7月，“在北京、河南信阳东岳和明港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sup>①</sup>。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直到先生晚年的1997年，他还不断深入田野工作第一线，但由他主持的考古工作，基本上结束于郑家洼子的发掘，那一年他41岁。

田野工作是安志敏先生考古研究的基础。在坚持田野工作、及时完成考古报告之余，先生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综合和专题研究，使他享誉国际，成为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史前考古的权威学者。从1950年先生入所算起，到1956年短短的七年间，先生发表各类研究论著多达37篇（部），优异的成绩使先生在1956年被擢升为副研究员，成为其时考古研究所最年轻的高级研究人员。

除了繁重的田野和研究工作，安志敏先生还是新中国考古教育事业的开拓者。1952年，28岁的安先生刚从北京大学史学研究部毕业，就参加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教务处，担当起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陶器和田野考古的授课工作。次年，又参加了第二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授课并辅导在郑州二里岗、洛阳烧沟开展的田野实习。从1953年开始，先生参加刚刚组建的北京大学史前考古学教研组，为本科生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直到1957年以后北大有了自己的专业教师，他才结束这项工作。此外，他还在河北、陕西等省的考古训练班或集训班上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先生又招收了多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不仅讲授《考古学概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等课程，还亲赴田野第一线指导研究生的实习。为中国考古人才的培养尽心竭力，做出了杰出贡献。

1972年安志敏先生奉命从河南明港回所，筹备《考古》和《考古学报》的复刊事宜，并与夏鼐、王仲殊先生组成三人小组，负责两刊的编辑工作。1978年成为《考古》主编。同年先生晋升为研究员并担任第一研究室主任。1982年~1985年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还担任考古研究所第二届（1979）和第四届（1994）学术委员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84）等职。1979年，先生参加在西安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秘书长和常务理事，同年被推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和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全新世分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被推选为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1990年当选为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安先生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1986）编辑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兼新石器时代部分主编，他也是总结新中国考古成就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一书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安志敏先生兼通日语和英语，曾先后访问过埃及（1958）、叙利亚（1958）、阿尔巴尼亚（1962）、埃塞俄比亚（1973）、伊朗（1977）、罗马尼亚（1977）、德国（1980、1985、1987）、日本（1981、1983、1984、1989、1990、1991、1992、1993）、意大利（1985）、英国（1986）、韩国（1995、1998）、美国（1996）和我国香港（1991、1994、1996、1997、2002）、台湾（1999）等地，和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交往和联系。1991年12月至1992年5月，年近七旬的先生担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为中日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谱写了新的篇章。

## 二

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方面，安志敏先生着力最多，取得的成就也最大。自1921年发现仰韶文化以来，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成为中国考古学界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仰韶文化自西而东，龙山文化自东而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三四十年代的主流看法<sup>②</sup>。但是，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尽管尹达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怀疑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包含着不同时期的堆积<sup>③</sup>，但一直到50年代初夏鼐先生率队再次发掘仰韶村时，还曾提出所谓“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的看法<sup>④</sup>。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主要是通过由安志敏先生主持的庙底沟和三里桥遗址的发掘完成的。他们在庙底沟等遗址发现，仰韶和龙山文化不仅有层次上的区别，在文化内容上也互不相同，并不见所谓“混合”的痕迹。庙底沟遗址发现的晚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在面貌上既不同于仰韶文化，也与所谓“河南龙山文化”不同，而介乎两者之间。由此安志敏先生提出“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的概念，认为它属于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具有由仰韶到龙山的过渡性质，最低说明了豫、晋、陕一带的龙山文化是由仰韶发展而来的，对中国古代



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上提供了有力的线索”<sup>⑤</sup>。

这个现在看来平平常常的结论，却是几代人数十年摸索的结果，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它对于我们澄清仰韶文化的概念和内涵，全面审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进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中国最早发现的两个史前文化。与讨论两者关系密不可分的，是两者各自的分区和分期研究。安志敏先生是根据新的考古材料，最先明确提出两种文化的分期和分区研究的。考古界所熟知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的概念和“典型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的概念，就是由他率先提出的<sup>⑥</sup>。在5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论文中，先生不仅对这些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给予不同的命名，而且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辨析它们的源流，使龙山文化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经过类型学的比较分析，他明确指出，河南、陕西和山西的龙山文化，是继承了仰韶文化而继续发展的，至于“山东等地区的龙山文化则可能另有来源”，但又特别提出“至于最近所发现的许多缺乏灰陶或具有彩陶的遗存可能是它的前身”<sup>⑦</sup>，这也就是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另有来源，以新沂花厅村、滕县岗上村和宁阳堡头等为代表的遗存（即后来我们熟知的大汶口文化），当可能是它的前身。

自30年代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就是纳入龙山文化的范围之内加以考察的。梁思永先生曾经把龙山文化划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个地区<sup>⑧</sup>。随着田野资料的积累，安志敏先生又把这三个地区扩大为沿海地区、中原地区和江浙地区，同时根据文化特征的分析，对各区内部进行了划分。比如中原区就被细分为豫东、豫北、豫西和陕西地区。长江下游虽然暂时仍被列入龙山文化，但通过分析，他认为可能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遗存，可能代表不同的时代，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可能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既不是仰韶文化，也不是龙山文化，后者虽可能受龙山文化影响，但并不属于龙山文化，却可能是由前者发展出来的，敏锐地觉察出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特殊性和土著性<sup>⑨</sup>。在稍后关于《干栏式建筑的考古研究》一文中，他更进一步提出，“当中原文化的影响没有到达这里以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阔地区的土著文化，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保持了某些共同特征，除‘干栏’式建筑以外，尚有许多其他因素，当它逐渐被中原文化吸收或融合之后，便形成了汉文明的一部分因素。探索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远古文化的性质、类型和消长过程，为我们今后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sup>⑩</sup>同理，通过文化因素的分析，安志敏先生又指出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虽然近于陕西龙山文化，但也具有它自己的特点”。尽管他觉得这种区别的性质（究竟是文化之间的区别还是文化内部的区别），还有待于研究<sup>⑪</sup>。实际上，尽管当时因为发现上的局限性，还不可能对各地史前文化的谱系做出更明确的分析，但是安志敏先生通过类型学的考察，已经充分认识到各地史前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一点从他对仰韶文化、龙山